

傅璇琮 主編

寧波通史

元明卷



寧波出版社

傅璇琮 主编
钱茂伟 毛阳光 著

宁波通史

元明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波通史. 元明卷/傅璇琮主编; 钱茂伟, 毛阳光著.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80743-403-0

I. 宁… II. ①傅… ②钱… ③毛… III. 宁波市—
地方史—元代 ②宁波市—地方史—明代 IV. 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2885号

责任编辑 叶贤权 井志强

本书为宁波市重大文化研究工程项目成果

导 论

《宁波通史·元明卷》，上起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下迄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前后368年。

1276年，随着南宋政权的灭亡，元军很快进占庆元地区。元政府在这里设置了庆元路总管府来管理地方事务，长官为达鲁花赤和总管。此后，都税使司、司狱司、平淮行用库、府仓、织染局、杂造局、儒学教授司、医学教授司、蒙古学教授司、阴阳学教授司、惠民药局等职能部门也渐次设立。其他不隶属于路而听命于行省的地方重要机构如市舶提举司、浙东盐司、庆绍海运千户所、驿站与递铺也都相继设置。这样，元在庆元的统治体系就逐步建立起来。由于庆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故元政府非常重视对庆元的控制。大德七年（1303年），元政府还将浙东宣慰使都元帅府官署迁到庆元路。另外，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司分司也设于庆元。为了加强军事控制并防范海盗和倭寇，元政府先后调派沿海翼上万户府和蕲县翼上万户府镇守庆元。镇守的重点在录事司（即庆元城内）、昌国州（今舟山市）和定海（今宁波镇海区、北仑区）等处。地方治安则由捕盗司和尉司所设置的巡检司负责。

元统治庆元时期，由于政局稳定，统治者重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里的人口呈现增长的态势。在地方居民管

理方面,城市实行坊里制,乡村实行乡都制。元朝的户籍制度以人户为中心、以人身奴役为主要内容。元政府将庆元百姓根据职业不同编为“诸色户计”,于是出现了民户、匠户、儒户、军户、医户、灶户、弓手户、打捕户、驿户、急递铺户、船户等。不同职业分工的人户为政府提供专门的劳役,担负职役与力役。除了劳役之外,百姓要向元政府缴纳税粮、科差与各种税课。劳役的繁重、田亩数目的混淆不清、盐额摊派过重等,给庆元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虽然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来扭转这种局面,如均定户役、清查田亩数额、减轻盐额等,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面对地方政府的剥削与压榨,百姓不堪重负,纷纷起事,反抗元的统治。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元初杨镇龙起义,元末方国珍起义。方国珍建立的政权结束了元政府在庆元的实际统治。

宁波的经济自南宋以来就拥有良好的基础,加之受宋蒙战争的影响比较小,元代庆元的农业、手工业、渔业、商业呈现继续发展的景象。农业方面,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扩大,麦子已经得到广泛种植,桑、麻、芝麻、茶、蔬菜、果品、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方面,庆元有官营纺织业和武器、船舶制造业,民间的造纸、酿酒、冶铁、编织等行业都具有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官私印刷业相当发达,刊刻了大量书籍,加快了文化的传播和文化事业的繁荣。渔业方面,海产的养殖与加工继续发展。庆元地区是元代重要的海盐生产区,拥有数量众多的盐场,此时的制盐技术和盐产量又有所提高。由于资源的丰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元代庆元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沿海人口从事商业经营,其中最为发达的是庆元城与鄞县,庆元周边地区的商品经济也有所发展。元代庆元经济的发展是和当地人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分不开的。面对沿海土地资源比较匮乏的客观环境,庆元百姓不畏艰险,努力开发自然资源,围海、围湖造田,开垦山间田地。另外,地方官员和民众还营建了大量水利工程来保障农业生产。在他们的努力下,元代庆元的农业持续发展,农田面

积进一步增加。有元一代,庆元地区自然灾害频繁。面对自然灾害的威胁,庆元地方政府和官员通过蠲免和赈贷等方式积极开展救灾活动,民间一些乐善好施的富户也拿出自己的余粮接济灾民,使得“郡民无凶岁之虞”,维护了地方经济与社会稳定。

宁波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前哨,从全国军事角度来看,它处于东南沿海的国防线上,是保家卫国的重心所在。从全国经济区域分布来看,它位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带的南翼,又是外国消费品的销售中心,唐宋以来,宁波成为长江三角洲区域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这种贸易大门位置,使宁波名闻遐迩。元朝时,从庆元港进口的货物有 224 种,足见它在全国港口中的地位。

与宁波东北方向隔海相望的是日本。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地的国内贸易市场,可以满足物品交易需求,这使中国对海外市场、国际贸易开拓不力。而岛国日本,情况则完全相反,资源相对贫乏,国内市场狭小。中国是当时东亚大陆上最富庶的国家,日本对中国有着强烈的贸易需求。在和平时期,中日间的贸易可以正常进行;而一旦国家利益受到战争威胁,中国往往要断绝贸易关系。中国要安定、要防卫,日本要贸易、要掠夺,于是冲突不断,这就是元及明时期处于中日关系前哨的宁波在国家政治军事生活中占据特殊地位的原因所在。元朝征服南宋以后,曾想征服日本。至元十一年(1274 年),派忻都、洪茶丘率 15000 名士兵,乘 900 艘船,第一次远征日本,取得小功而回。至元十八年,阿塔海、范文虎率江南军将士 10 万人、战船 3500 艘,从宁波近海出发,第二次征讨日本。元军已经到达日本,大功将成,突然台风大起,元军船队绝大部分沉没,仅范文虎等少数人得以逃回中国。其后虽有第三次征远日本的计划,终因多种因素制约而中止。元政府虽在宁波建立了庆元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但政府官员的态度并不积极,国际贸易活动相当微弱,日本人、高丽人只是偶尔来华贸易。这样的贸易活动,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日本进入战国时代以后,一些战败的武士,有不少流窜至高丽、中国沿海烧杀抢掠。这批

日本浪人,被中国称为倭寇。倭寇的出现,使得本已脆弱的中日关系越发紧张而复杂。

这一时期,庆元的城市与交通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庆元城,元政府设置录事司进行管理,市区施行坊社制。庆元城虽然在元初被拆毁,但到了元末,由于军事的需要又由纳麟哈刺和方国珍先后重建,宁波避免了战火的波及,成为元末动荡局势之外的一方乐土。除了庆元城之外,宁波周边的市镇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元代宁波地区之间的交通也较为发达。驿站与递铺加强了与周边地方的联系。由于河网密布,水路交通是该地区重要的交通手段,因此疏浚河道,修建桥梁,都是宁波的官员和百姓经常关注和参与的地方工程,这些都促进了宁波交通事业的发展。在元中后期,庆元是粮食北运的重要基地,从这里出发的粮食海运对维持元政府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元代的文化事业和宋代相比较为逊色,但宁波地区由于秉承南宋以来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元代宁波的学校教育进一步完善。随着元统治者“汉法”的进一步推行,除了传统儒学教育外,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学校都相继建立起来,学科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书院的数量也有所增加,还出现了乡学与义学。随着理学的兴起,教育的理学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程端礼无疑是为儒学教育作出重大贡献的教育家,其《读书分年日程》影响了元明清的儒学教育。入元以后,南方地区政治地位下降,学术走向民间。浙东是陆学活动的中心,有赵偕诸人不遗余力地加以倡导。同时,自黄震、史蒙卿以来,朱学在浙东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史蒙卿弟子程端学无疑是代表人物之一。

元代浙东史学的发展一度衰微,但在宁波地区还是出现了如胡三省、袁桷、陈桱、马易之等著名史学家。在方志学方面,《大德昌国州图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三部珍贵的元代方志,体例完备,内容翔实,都是对后世方志学影响非常大的方志著作。

元代宁波在文学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涌现出一大批成就卓著、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其中突出的有戴表元、袁桷、张可久,瑞安人高明寓居宁波期间创作的《琵琶记》对南戏有相当大的影响。元代宁波科技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祖国传统医学的进步上,出现了众多的名医,最为卓著的是医学家滑寿,此外还有吕复、陈公亨、项昕等。

虽然元代是蒙古贵族建立的王朝,但是除了一些蒙古、色目人来到庆元仕宦或戍守之外,外来文化因素对庆元的影响并不大。相反许多居住在庆元的蒙古、色目人逐渐开始被阅读儒家经典,遵循汉族礼俗,逐渐开始被汉化。较为发达的官方和民间的儒学教育使儒家理念和文化仍旧在知识分子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民间百姓的角度来看,元代庆元地方还保持着传统汉族社会固有的风俗习惯。尤其在传统生活习俗上,传统汉族礼俗的影响仍旧是根深蒂固的。汉族社会的传统节日如元日、元宵、寒食、中秋、重阳等,还在庆元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元代庆元百姓的信仰空间中,佛教仍是民众最为普遍的信仰,庆元也拥有大量的佛教寺院。许多寺院不仅是地方信仰的中心,也是民间百姓休闲娱乐、士大夫谈文论道的文化交流中心。此外,道教虽然势力没有佛教大,但在民间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东岳神、城隍神、天妃等神灵崇拜,也是庆元民众信仰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些都体现出元代庆元传统文化的氛围与气息。元代庆元还有伊斯兰教寺院,给庆元增添了一些异域文化的色彩,但其信徒主要限于寓居在这里的色目人,与民间大众的信仰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些都构成了元代庆元多层次、多元化的信仰空间。

二

明代历史时间跨度比较大,近三百年。明代宁波历史的演变历程,大体以正德、嘉靖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洪武至正德(1368—1521

年)为前期,嘉靖至崇祯(1522—1644年)为后期。

元明地方政府在宁波的交替比较顺利,方国珍政权没有什么大的抵抗,就归降了明朝。方氏投降后,明朝委官接管了宁波。明初宁波称明州,洪武十四年(1381年),改名宁波,从此有了今天所称的宁波。明代地方实行省、府、县三级行政管理体制,浙江是全国15个省级行政区之一,宁波是浙江11府之一。宁波府下属6个县。至于今天的宁海,当时属于台州府,而余姚属于绍兴府。府的最高长官称知府,县的最高长官称知县。除了宁波府、县两级机构外,浙江布政司在宁波设有三个分支机构,即按察分司、布政分司、两浙盐运分司,一个省级机构即浙江市舶司。

明朝建立后,宁波地方官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社会秩序,减轻百姓负担,表现为与民休息、改革弊政、减免赋税、规范赋税征收工作。明中叶,由于外战内乱少,政治高压出现松弛,社会经济开始有所复苏。

地方官的立场是双重的,一方面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得维护地方利益。维护地方百姓利益,表现为偶尔不服从上级指令、工事不扰民、约束吏胥、禁止驻军扰民、锄强扶弱、力阻太监扰乱地方、慎刑缓刑,为地方办实事,做好事。

明朝宁波的地方治安,主要由乡村里老制度、交通要道安全检查制度与小区巡夜制度组成。明中后期,部分地区实行了保甲法。晚明时期,由于内乱外患,海盗不断,引发了多次反抗事件和农民起义,如胡乘龙起义。

明代地方对国家应承担的义务,主要有赋与役两大类。明代以农立国,相当长时期内,实行实物化赋税制度。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明代百姓作为国家成员,都有承担赋役的义务。不过,按国家政策,部分人可以享受免除赋役的特权。宁波的赋役平均改革工作也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时属绍兴的余姚实行的一条鞭法具有创新意义。

明朝建立以后,即有倭寇骚扰沿海的报告。宁波沿海诸岛即今天的舟山群岛上的民兵突袭了刚从福建凯旋的明朝水师,并沿甬江攻打宁波城。这批人且有外通倭寇的迹象,直接威胁着明朝的国防利益。明政府派老将汤和到浙东沿海,指挥海防体系的构建。洪武二十年(1387年)前后,沿海建立了以卫所为主体的海防体系。沿海卫所的总指挥称总兵,驻守在宁波。这个职位以后改为备倭都指挥,专门负责倭事宜。

在与日本的交往中,朱元璋了解到倭寇的民间海盗性,想让日本政府约束倭寇的活动。于是,派使者到日本,与日本建立了朝贡式外交关系。不过,民间倭寇扰乱活动并没有因此中断。朱元璋决定与日本断交,关闭了设在宁波的浙江省舶司,加强海禁。成祖继位(1403年)后,与日本重新建立朝贡贸易关系,浙江省舶司重新开设。在中日关系中,明朝无疑占据主导地位。为了政府的利益,明朝制定“永乐事例”,规定日本朝贡明朝的间隔期、人船的数量。不过,实际操作中,日本并没有遵守十年一贡的规定。宣德继位(1426年)后,又重申了朝贡贸易的间隔期、人船的数量,史称“宣德事例”。此后,日本基本遵守十年一贡的规定,但民间的倭寇仍不时扰乱中国。

正德末年嘉靖初年,宁波港有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民间贸易在兴起,福建商人开始来到宁波的双屿港筑巢。另一方面,朝贡贸易出现了问题。当时的日本处于君弱臣强时期,大权由几个诸侯控制。由于朝贡贸易有较大的利益,故而两大诸侯争着派贡船到中国。嘉靖二年(1523年),两批贡使先后到达宁波,浙江省舶司处置不当,引起两贡使内讦,史称“宁波争贡事件”。争贡事件后,明朝皇帝下令关闭了浙江省舶司。宁波正常贸易管道的堵塞,导致了走私贸易的大兴。嘉靖三年,海商将日本贡船引到双屿港进行贸易,开双屿港国际贸易之先河。不久,海商又将原在广东做生意的葡萄牙等国的商人引到双屿港。由于受国际贸易高额利润的吸引,江浙一带有官员背景的“势豪”及无法生存的穷人纷纷加入国际贸易队伍。他们贿赂宁波地方官

员及守军,取得他们的保护,再加上海商武器的先进,导致双屿港民间国际贸易规模越来越大。双屿港的兴起,是中国贸易中心北移的表现。海商规模的扩大,杀人越货行为的出现,中外贸易的不规范性,贸易纠纷的增加,为明政府的出兵镇压提供了口实。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浙、福海上巡抚朱纨下令出兵,强行捣毁了双屿港。双屿港的捣毁,表明对于明朝政府而言,国家安全利益高于民间经济利益。海禁派的强硬立场,招来浙江、福建地方的强烈反弹。在政府锁国与民间开放的博弈之中,演绎了影响深远的“嘉靖大倭寇”事件。嘉靖以后,宁波设立了浙直总兵。浙直总兵与分巡海道的出现,正说明了宁波海防形势的严峻。

隆庆以后,政府虽然开放了西洋贸易,但日本一直被列入贸易制裁国之列,至明亡不变。万历中期,曾有人要求开放宁波口岸,但受到宁波籍阁老沈一贯的抵制。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虽然恢复了浙江市舶司,但仅是国内贸易稽税机构。由此可见,双屿港的消失,使宁波失去了成为东亚国际贸易中心的机会。

明代以农立国。影响农耕社会发展的外部因子,主要是国家政策与自然灾害两大方面。对经济影响最大的是国家政策。影响宁波地方发展的国家政策是多方面的,最为核心是国家的海禁政策。宁波是沿海地区,需要借助国际贸易,才能谋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国家安全向来是最高管理层优先考虑的问题,由于不能知彼知己,结果采取了不适当的海洋政策。海上防卫与港口贸易纠缠不清的结果是,严重影响了中国利用海域、港口发展国际贸易之路。没有国际贸易的开放,宁波的活力就无从体现。此外是自然条件的限制。明代宁波,自然灾害特别频繁。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应有尽有。靠土地、靠外在自然条件的农业,经不起自然灾害的频繁肆虐。有自然灾害,就会有抗灾减灾活动。在政府管理社会体制下,抗灾减灾工作主要靠政府来组织。地方政府的抗灾减灾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求雨、赈灾、建社仓、劝输平糶、宽征、维护粮食市场。方法比较单调,且参与赈灾之人,

多为当地农业富户。

明代的宁波实行麦稻两熟制。一般说来,农村冬季种麦,春季种稻。江南是蚕桑业基地,宁波也不例外。棉花自宋元以来逐渐推广,到明代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农业的商业化程度很低。明代宁波生产方式有一定程度的多样性,渔业仅次于农业。明代是宁波海洋渔业资源较为丰富的时代,虽有海禁及战争阴影,宁波渔业仍生存着。

明代的手工业发展环境与历代一样,是在官营体制下进行的。产品的销售目标,产品的数量,技术的改进,都取决于官府的需求。在官营体制下,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呈简单再生产之势。明代宁波本地的刻书业并不发达。在严厉的海禁政策下,宁波的造船业主要是为军事需要而存在的,民用造船业发展滞后。明代前期,实行打击豪强政策,商人也在打击之列。明代中叶,随着农耕经济的自我积累,乡村市镇的复兴,商业有了量上的积累,商人也逐渐增多。在海外贸易中,宁波产生了一批新兴的贸易商人。在国际贸易无望的情况下,宁波商人转而向内陆发展,瞄准了国内贸易市场。

乡村是传统社会的核心,城市是管理机构所在地,同时也是部分士大夫与居民生活的地方。在明代宁波,府城自然是最大的城镇,第二层次是县级城,第三层次是卫所军事城。宁波城有城墙,有六个大门。行政区为鼓楼内的子城。宁波府城设在鄞县县城内,故宁波城由府城与县城组成。子城之外,就是罗城,它是百姓居住区,实行坊、厢管理制度。明代没有专门的商业区,商店集中在大街小巷两侧。宁波是一个海港城市,地近海,民逐鱼盐为生,列肆负贩。这是一种自然与人文结合的海洋文化景象。

明朝的乡村行政制度,实行乡都(或乡里)制度。和历朝一样,县下有乡级行政区划,但没有乡级行政机构。农村地区,人们一般聚族而居,一姓往往构成一村。乡村地区聚落的规模比较小,一般以数十户为一村,数百户一村的,就算得上是大村了。一个宗族构成一个自然社区,宗族实行自治。在农村地区,乡民们以一家一户为中心,男耕

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般农民家庭的生活状况,都是相当艰辛的。一年之中,岁时节日是乡村地区最热闹的日子,也是男女老少最快活的日子。

交通道路是人类生存发展及与外界往来的重要凭借。古代社会的交通,主要是陆上与水上两种。从交通成本来说,水运节省,故而古代社会水运发达。外国人航海来朝贡的,一般都要经小港进入甬江,抵达府城三江口,登陆上岸。可惜,明代实行海禁政策,放弃了海上运输,故明代宁波海运业不发达,只有私人在海上偷偷从事运输工作。

教育的主体是以政治人才培养与选拔为核心的儒学教育,设有社学、县学、府学。明代科举是全国性的文官选拔考试,科举是教育与文官的中间环节。读书—科举—入仕,是明代读书人的三部曲,也是宁波读书人的三部曲。明代官学兴起的结果,就是私学的衰落,国家政策的导向决定了民间书院的命运。

为了保持各省间的平衡,明代科举实行区域配额分配机制。浙江省每一届乡试录取名额是95人。此外,有一部分浙江人通过应天府乡试,取得会试资格。由于浙江是教育大省,每届进士及第的人数,往往居全国各省之首。宁波是浙江省各府之中考取进士最多的府,共计882人。就区域来说,居全国第一。其中,余姚、鄞县、慈溪三县进士及第率最高。

科举人才的培养,为宁波造就了一大批政治人才,他们分布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据《浙江人物简志之二》,明代宁波著名的政治人物有叶伯巨、方孝孺、乌斯道、金忠、陈敬忠、张楷、陆瑜、杨守陈、金湜、杨守阯、杨守随、屠濬、张曷、谢迁、姚镛、丰熙、王阳明、黄宗明、张邦奇、刘世龙、王钊、冯岳、赵文华、万表、张时彻、吕本、范钦、颜鲸、赵锦、孙钜、沈一贯、薛三才、薛三省、万邦孚、李耘、冯元仲、黄尊素、冯元颺、高斗枢、钱肃乐等。

文化是人类的观念性成果。明代宁波出现了方孝孺、王阳明等闻名全国的重量级学术人物,故而明代宁波人学术思想的活跃与创新程

度,在全国首屈一指。

方孝孺是一个比较注重政治道德践履的人。靖难之际,方孝孺作为建文忠臣,以其悲壮的个人牺牲,成就了忠义形象,对后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明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方孝孺以气节振兴了理学。浙东自南宋以来,心学有比较大的市场,所以,宗朱而不尽合于朱。明代中期,四明地区的朱学大家是黄润玉、杨守陈。景泰、天顺、成化间,杨守陈《诸经私钞》“妄更圣经贤传”,实际是一种“叛儒先而紊圣经”的异端举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年),思想界又兴起了一股以非议程朱为主旨的力量,这就是王阳明所建立的“王学”。阳明心学集宋明心学之大成,发展了象山心学、慈湖心学及白沙心学,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阳明卒后,浙东王学的盟主是王畿和钱德洪。钱氏较保守,他以维护师说为己任。姚江书院是明末清初由余姚一群学术观点较一致的学者为传播阳明心学而创立的一个学术活动中心。因讲学于该书院而形成的学术团体,可称为姚江书院派。姚江书院派的前期代表是以沈国模为首的“四先生”,中期代表是韩孔当,后期代表是邵廷采。

在明末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宗教主要是佛教与道教,尤以佛教影响最大。中国佛教的成长,一直受到政府的干预,明朝尤其明显。明朝采取了打压政策,限制佛教的自由发展,故而,宁波的寺院数量有限,规模也不大。直到晚明,才有所松弛。天童寺的密云圆悟复兴、壮大了临济宗,一度独领风骚。由于理念的不同,密云圆悟和他的弟子汉月法藏和法藏的弟子谭吉弘忍“祖孙三代”终于产生了争执,双方笔挥墨泼,互相攻讦,震惊了佛学界,这就是“密汉之争”。佛教、道教、基督教,在中国的国家体制下,只能起到补充作用。儒家学说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扮演了一种准宗教角色。

方孝孺虽不是史学家,但其史学思想对有明一代民族主义史学影响甚大。杨守陈比较关注国史纂修,称“国史有三大阙事未举”。薛三省《实录条例》高明之处,在于术语的提出,且有规范性文字解释。薛

三省《实录条例》的产生,意义很大,标志着实录编纂理论水平的提高。薛俊《日本考略》是明朝人写的第一部介绍日本的图书。县志的广泛编纂,是明代方志发展中较为突出的现象。

万历以后,中国戏曲创作进入了黄金时代。宁波籍戏曲家屠隆、叶宪祖、周朝俊、吕天成,在万历剧坛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从而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戏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明朝宁波著名的画家有吕纪与王谔。明代宁波琴艺的代表是徐洗,徐氏一门四代从事琴艺,人称“浙操”。

由于教育文化出版业的发达,明代宁波的藏书家、藏书楼众多,著名的有丰坊之万卷楼、范钦之天一阁、范大澈之西园、陈朝辅之云在楼、陆宝之南轩。天一阁在当时是一个普通私家藏书楼,并不引人关注,后经受了天灾人祸和时间的考验,就备受世人注目。天一阁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世界最古老的三大藏书楼之一。

古代中国的医生,分为政府职业医生与民间江湖郎中两大类。一般说来,医生需要专门学习,需由家传或师徒传授;但也有部分读书人自学中医知识,以此成为医生,甚至名医。在国家管理体制下,政府不允许民间医生私自组织专门的医疗机构,故明代宁波民间医生多为家庭小门诊,且大都上门服务。明代宁波著名医家人数众多,达六十多人,还涌现出一批医学专著。著名的有王纶《本草集要》、《明医杂著》,高武《针灸聚英发挥》,赵献可《医贯》,高斗魁《医学心法》、《四明医案》。宁波的科技发明不多,主要体现在天文学领域。弘治以前,钦天监垄断天文技术,因此,有发明创造的人也只能出于钦天监。宁波人后裔贝琳无疑是明代前期钦天监中最著名的天文学家。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关键的一个朝代,前期社会生活的僵化,后期社会生活的活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明代宁波历史,同样不例外,表现出明代前期社会生活的单一化,后期则呈现多样化。正德以后,人们开始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更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传统农耕社会,职业变化不大,“四民”守常业,各食其力,生产、生活方

式相对简单。在农耕时代,农业的伦理道德占据上风,商业道德遭到否定。士大夫生活相对丰富一些,他们有余力从事一些精神活动。明朝中期以后,乡间士大夫文会盛行。太平盛世,经济发展后,人们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余姚、慈溪民间流行戏文,城内挟妓饮博等现象较为常见。豪门权贵穷奢极欲的行径,士大夫们放纵声色的影响,市井平民追逐享受的欲望,在社会上掀起奢靡之风,由此而引发的越礼违章行为,在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不断涌现。中国的四时八节习俗,是建立在农耕社会基础上的。由于生活方式的长期延续性,习俗的变化并不大。

元代宁波城墙遗迹 ▶



▲ 元代永丰库遗址



▲ 永丰库方胜纹饰砖砌道路